



当代方志编纂述论

王卫明 著

河南社会科学文库

2015年辑

河南人民出版社

当代方志编纂述论

—※—

王卫明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方志编纂述论 / 王卫明著. — 郑州 :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 - 7 - 215 - 09787 - 2

I. ①当… II. ①王… III. ①地方志 - 编辑工作
IV. ①K29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82239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编辑邮箱:313137877@qq.com 电话:65788050)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文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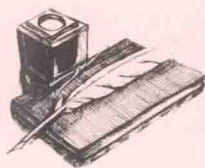
开本 680 毫米×960 毫米 1 / 16 印张 19.5

字数 300 千字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 60.00 元



—2015年辑—
河南社会科学文库

河南社会科学文库编委会

主 任	李庚香	何白鸥
委 员	李庚香	何白鸥
	孟繁华	唐玉宏
	王喜成	王朝纪
	张钢杰	关玉梅
	李自强	

总序

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充分调动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科研积极性、创造性,鼓励社会科学界多出成果、多出人才、多出精品力作,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为加快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自 2010 年起设立《河南社会科学文库》资助出版项目,对入选的优秀成果,统一标识,统一版式,统一封面设计,由河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提供全额资助,交河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至今,已出版了五辑共 50 余册。

2015 年是河南改革发展进程中不平凡的一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总引领,团结带领全省干部群众,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积极探索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经济社会发展保持良好态势,“四个河南”“两项建设”取得可喜成果。在此背景下,河南省社会科学界立足社会发展实践,紧密结合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认真思考,深入研究,推出了一批富有时代特色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为展示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鼓励支持更多的专家学者致力于社会科学研究和理论创新,我们在总结前几年文库出版经验的基础上,策划出版了 2015 年《河南社会科学文

库》，包括《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中国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自觉论》《恩格斯历史合力思想新论》《领导干部网络舆情工作科学化研究》《当代方志编纂述论》《河南粮食产业发展研究》《河南省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研究》《循环经济与“四化”同步发展研究》《企业技术创新生态环境论》等 10 部著作。这些作品或侧重理论，或侧重实践，或两者兼而有之，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反映了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水平，展现了特定历史条件下河南省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探索、思考和创见。

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深感任重而道远。在“十三五”开局之年，希望社会科学界坚持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总引领，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凝心聚力，勇于开拓，推出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为推进理论创新，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让中原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更加出彩，增添浓重的一笔。

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15 年 12 月

目 录

引 言	1
-----------	---

基 础 篇

第一章 基本理论	13
第二章 框架结构	23
第三章 内容记述	66
第四章 语言表达	110
第五章 资料著述	121

专 志 篇

第六章 位置、建置、政区志	145
第七章 自然环境志(地理志)	150
第八章 环境保护志	161
第九章 土地管理志	167
第十章 城乡建设志	175
第十一章 经济综述	185
第十二章 农业志	190

第十三章	工业志·····	202
第十四章	商贸服务志·····	209
第十五章	企业志·····	221
第十六章	经济体制改革编纂·····	228
第十七章	政治体制改革编纂·····	241
第十八章	政党志·····	252
第十九章	政权志·····	257
第二十章	政法志·····	263
第二十一章	文化志·····	268
第二十二章	教育志·····	278
第二十三章	科技志·····	286
第二十四章	卫生志·····	291
第二十五章	社会志·····	297
参考书目·····		305

引言

方志是一种综合性记载地方地情的资料文献,在世代不断地编修中传承两千多年,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书籍,它的编纂经历着从简单到复杂,从没有体例要求到自成体例规范,从私人纂修到官方组织编纂,不断编修、不断完善、不断记录历史的一个过程。在探索当代方志编纂时,应该回顾它的历史,了解它的过去。

“方志”一词,最早见于《周礼》:“诵训,掌道方志。”汉代郑玄注:“志,记也。”“说四方久远之事,以告王观博古所识。”方志“这种著作的内容,开始比较简单,所分之类亦不过地图、山川、风土、物产、人物数种而已”。^①从人们研究方书起源的认识,可看出当时方志内容的单一。起源于秦之前的古国国别史之说,将晋国史书“乘”、鲁国史书“春秋”、楚国史书“梲杌”,视为方志的起源;起源于古地理书之说,将《山海经》《禹贡》视为方志的起源;起源于古地图之说,将古图经视为方志的起源。无论哪一种说法,其源头追溯的古籍所记载的内容仅是某一方面的地情,如秦之前的古国国别史,记载的是各国地方历史的地情书;古地理书,记载的是地方山川、物产的地情书;古图经,在图上标绘山川、植物、物产,成为掌天下之图。这些古籍与后世方志相同之处都是地情的记载者,由此后人将它们视为方志的起源。但古籍内容单一、记载简单,更谈不上编纂,单将某类著作视为方志的起源,都无法承载。这也符合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规律,从简单到复杂,前世的地方历史、地理、地图,已是后世方志容

^① 仓修良:《仓修良探方志》,华东师范大学2005年版,第24页。

纳的内容,由秦之前的各类单一地情古籍多源汇流,经秦汉魏晋南北朝逐步向综合性方向发展,才出现后世方志迹象。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地方豪族地主势力的发展,国家用人门第制度的形成,为控制地方选人,地方豪族热衷编写家谱,标榜门第关系,大肆撰写各类地记,宣传乡贤人才,本郡县的优势,体现人杰来自于地灵。因此,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上编纂了大量反映地情的书籍,且种类繁多。唐代刘知几《史通·卷十杂述》曾将其归类为十种,即“樞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记、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①。这些杂述出现为今后方志的成型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方志源头。如东汉末年班固的《汉书·地理志》,是全国性的地理志,它以西汉行政区划为单位,分别记述每一地区的户口、山脉、河流、关塞、祠庙、物产等,它不仅是地理学的代表著作,它按照行政区划为单位的记述,也影响了后世方志,成为全国性总志的代表。郡书是郡国之书,记当地乡贤耆旧事迹,汉代郡书已亡佚,从后世书目辑录中有《陈留耆旧》《汝南先贤》《沛国耆旧传》等,所记内容相当于后世方志中的人物。都邑簿是以城邑为对象,记述城池、宫阙、街坊、寺庙等,从后人辑本《三辅黄图》可以看出都邑簿的大致内容,“毕沅辑本(《三辅黄图》)分门别类,列有:三辅沿革、咸阳古城、长安古城、秦汉宫阙、城市、苑囿、池沼、台榭、辟雍、明堂、圜丘、太学、宗庙、社稷、南北郊、街市、楼馆、观、阁、署、库、仓、廐、圈、桥、陵墓,以及风俗、杂类等目。由此可知,《三辅黄图》所载与后世都邑志基本相同”。^②“地记是志书发展的早期形式”“由地方性的人物传记与地方性的地理著作相汇合而形成的地记,就是方志发展的早期形式。特别是在光武帝刘秀诏撰《南阳风俗传》以后,沛、三辅、鲁、庐江等地,都先后撰写此类著作,并且发展很快,几乎遍及各地。”^③这些杂述虽然名称不同,正如刘知几在《史通》中归为十类,但它们的内容是记载山川河流、建置沿

①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百部,唐代刘知几《史通·卷十杂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

② 王德恒:《中国方志学》,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第84页。

③ 仓修良:《方志学通论》,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

革、风土人情、地方人物等,具有后世方志的迹象。现代人所能了解到的,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东汉的《越绝书》《吴越春秋》,晋代的《畿服经》《华阳国志》。《越绝书》作者不详,它是一部地方史,周迅在《中国的地方志》里写到“它主要记载春秋时期吴国和越国(今江苏、浙江部分地区)的历史,另附有秦至东汉建武二十八年(52年)的史事,但它又以《记吴地》《记越地传》两篇叙述吴、越山川城邑,同时记载了吴王夫差、越王勾践、伍子胥、范蠡、文种等许多人物的事迹,虽然分类杂乱,但各篇自成首尾,不连续。明代就有人称它为‘地方祖’(《(万历)绍兴府志序》)。清代洪亮吉曾说:‘一方之志,始于越绝。’(《(乾隆)澄城县志序》),现代也有一些方志学家认为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方志’(朱士嘉《宋元方志传记索引序》)。”^①“晋代《畿辅志》,据《隋书·经籍志》介绍,此书有170卷。它除了和《汉书·地理志》一样地记载地理、风俗外,还记载了‘先贤旧好’,开创了地志记述人物的先例,这就向兼史地的地方志靠拢了一步。”^②《华阳国志》原名《华阳国记》(东晋常璩著),“一共12卷,它的前四卷以地域为纲,分布叙述巴、蜀、汉中、南中及所属郡县政区沿革、山川、道路、物产、人口和民情风俗等;第五至第九卷以年代为纲,按照时间顺序依次叙述历届政权的更替和重大事件,其中还包含不少谚语歌谣,用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最后卷三记述人物。”^③《华阳国志》将历史、地理、人物三者结合,体现出后世方志综合性的特点,是方志编纂的一大进步,因而被视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书。“就方志而论,《华阳国志》的内容和体例都较完备,反映了当时方志发展的水平,它是最早的四川通志,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以‘志’为名的方志”。^④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类杂述是其主体,但它们并非各自独立发展,而是互相渗透与融合,为后世综合性志书出现做了铺垫。经过漫长的发展,方志在隋唐两宋时期基本成型。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出现官修方志。隋朝是官修方志的开始。隋炀

① 周迅:《中国的地方志》,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65页。

② 周迅:《中国的地方志》,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57页。

③ 周迅:《中国的地方志》,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66页。

④ 来新夏主编:《方志学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3页。

帝杨广下令全国各郡县编辑本地的风俗、物产、地图上报尚书省,这是全国普修方志的开始。隋炀帝主持编写了我国第一部官修的全国总志《区宇图地志》,共129卷,隋代还编有151卷的《诸郡物产土俗记》,100卷的《诸州图经集》。唐朝更加重视图经的编纂和管理,全国各州府每三年或五年造图经上报尚书省。唐太宗时期,官方编纂了《括地志》550卷,反映唐初时期的行政区划以及各地地理沿革、风俗物产、掌故人物。为适应统治的需要,唐朝多次编修全国性的图志,除《括地志》外,还有《贞观郡国志》《职方记》《十道图》《域中郡国山川图经》《元和郡县图志》等。在当时,志和图经已是一个概念,互为通用。宋朝继承了隋唐官修方志的制度。宋太祖赵匡胤初定天下,即重申州县遇到闰年要造图上报。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下命重修天下图经,用四年时间,编修出宋朝第一部全国图经总集——《开宝诸道图经》。景德四年,宋真宗因感觉《西京图经》不完备,下令全国各地要重新校勘图经,并制定统一体例。这是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体例,使地方志书编纂有了标准要求。此次修成了《祥符州县图经》1566卷。宋神宗元丰八年又纂修《元丰九域志》十卷。由于隋唐两宋官修方志的制度化,地方图经不断按时上报,全国性图经总集连续编修,图经在此时期迅速发展。隋唐时期,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地方豪族势力的削弱,地方著作的各类地记,编修的越来越少,图经成为记载地情的主要方志。图经是有图有文字,“地图上要绘有郡县城池、水陆道路、山岭溪湖、步骑舟楫各得便于登涉者”“图经内容要求古今事迹、地理山川、土地所宜、风俗所尚”。“所谓古今事迹包括本州县历史发展、建置沿革、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故事传说等;所谓土地所宜,是指这个地方的土地适宜于种植哪些粮食、水果、蔬菜、药材、树木等,也就是平日所指的物产;所谓的风俗所尚,则包括这个地方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风俗习惯。”^①形成了有史、有地、有文的体裁。图经的地图与文字说明的分量是在不断地变化,早期的图经是以图为主,文字为辅。随着说明事件不断地增加,文字分量逐步增大。地图则因为绘制与印刷的麻烦,在图经中所占的分量越来越少。从北宋开始,图经的名称逐渐被“志”所代替。

^① 仓修良:《方志学通论》,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第184页。

如北宋元丰年间官修的《九域图》，因为没有图被奏请改称为《九域志》。到南宋时，图经数量大减，以志命名的方志猛增。隋唐两宋修志，由于官方的倡导成为制度，形成了地方政府主持，聘请有才学人士担任主编，政府提供相应保障，如此的修志模式被一直延续下来。

元明清时期，除继承隋唐两宋的官方修志传统外，元朝还创修一统志，元世祖忽必烈令纂修著称后世的《大元大一统志》1300卷，“《四库总志》对它评价很高：‘考輿地之书出自官撰者，自唐《元和郡县志》、宋《元丰九域志》外，惟元岳璘等所修《大元一统志》最称繁博。’同《元一统志》相比，《明一统志》仅90卷，不及其十一；《清一统志》初修为424卷，续修本增为560卷，仍不及元志之半。”^①元代方志编修仍然是继承宋代的模式，只是体例进一步完善，内容更加详实。仓修良在《方志学通论》里介绍袁桷的《延祐四明志》时，分析了元代方志在体例和内容上更加完备，增加人文内容，门类安排上新增学校、释道、集古三个目，新增三目体现了四明的地方特点。仓修良指出元代方志与前人方志的不同，指出方志通编使用“考”是为了避免与书名“志”的重复。如《延祐四明志》的篇目设沿革考、职官考、人物考、山川考、城邑考等20卷。《延祐四明志》另一个特点是每考前有以小序，简述该考所记内容概括，使用得非常得体，起到了画龙点睛之功效。“元代纂修州县志不多，见于著录的不超过160种。”^②明代方志编纂更为兴盛，不仅承元代继续编修大一统志，省、府、州、郡县也兴起修志高潮。明朝开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三年（1370年）令编修一统志，同年12月完成《大明志书》。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又诏纂《寰宇通衢》1卷，以天下道里类编而成，是一部全国性专业志书，专记全国交通水马驿程。永乐十六年（1418年）明成祖亦诏令全国各地郡、县、卫、所皆修志。“为划一规格体例，永乐时期曾两次颁降修志条例，确定方志内容应包括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城池、山川、坊郭、镇市、土产、贡赋、风俗、户口、学校、军卫、郡县廨舍、寺观、祠庙、桥梁、古迹、

① 来新夏主编：《方志学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9页。

② 来新夏主编：《方志学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0页。

宦迹、人物、仙释、杂志、诗文二十一类。”^①明景泰年间,纂修《寰宇通志》119卷。明天顺二年(1458年),英宗以《寰宇通志》繁简失宜、去取不当为由,命改编重修。天顺五年(1461年)成书,共90卷,赐名《大明一统志》。明代除官修总志外,还大规模普修省志。省志的编纂起于元代,大范围的普修是在明代。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明代省志有38种,几乎涉及当时所有的省份,有些省份甚至有5种省志,如云南。省志名称不定,有称通志,如《嘉靖河南通志》《嘉靖浙江通志》《隆庆云南通志》;有称总志,如《成化河南总志》《万历湖广总志》《嘉靖四川总志》;有称大志,如《嘉靖江西省大志》;还有称“记”“图经”“略”等。郡县志编纂更为普及,一些地区多次修纂,如浙江《六合县志》,先后六次纂修。“《万历满城县志》张邦政序说:‘今天下自国史外,郡邑莫不有志。’”^②修志成为地方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地方官员的文化素养,在中央政府重视和推动下,地方官员都将编修方志作为政绩,竞相从事。据《中国地方志书联合目录》统计,明代流传下的方志有千种左右。

清代是修志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不仅编修志书的数量庞大,并开始进行旧志整理,对于方志的理论研究也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清代三修一统志。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命各省督抚纂修通志,以备纂《大清一统志》所用,至乾隆八年(1743年),修成《一统志》342卷。乾隆年间再修《一统志》,共500卷。嘉庆至道光年间,第三次纂修《一统志》,共560卷。三次编修,前后经历了五朝。清代中央政府敕令各省编修省志,各省又通飭地方编修郡县志书,上、下联动,促使省府厅州县志的编修。《顺治河南通志》的编纂是清代大规模修志的前奏。河南巡抚贾汉复以明代《嘉靖河南通志》为基础,在顺治十八年(1662年)主持编修成《顺治河南通志》50卷,并由此推动河南郡州县都陆续编修了志书。《顺治河南通志》受到皇上好评。康熙元年,贾汉复调任陕西巡抚,又主修32卷的《康熙陕西通志》。比康熙十一年(1672年)清政府决定编纂《大清一统志》早10年。政府将《顺治河南通志》《康熙陕西通志》作为范本,昭示天下。

① 来新夏主编:《方志学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2页。

② 来新夏主编:《方志学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4页。

通志在清代是大为广修,除咸丰朝外,各朝都有通志,其中康熙、雍正、乾隆、光绪四朝编纂最多。清代通志编修时间长、数量多,每个省区都有三四部。除通志外,清代流传下来最多的乃是府厅州县志。“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现存清代方志约 5000 种,其中绝大部分为府厅州县志。”^①清代三次修纂一统志,这三次也是编纂府厅州县志规模最大的时期。编修一统志促使编修通志,编修通志又促使府厅州县志的编纂。清代修志的特点是大量名家学者参与,如章学诚撰《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洪亮吉撰《淳化志》《长武志》,戴东原撰《汾州府志》《汾阳县志》,杭世骏撰《西宁府志》《乌程县志》,姚鼐撰《卢州府志》《江宁府志》,等等。名家学者的参与不仅编修出一代名志,同时对于方志体例的讨论与研究,促使了方志理论的发展。清代对于方志编纂的理论研究形成两个学派。一是以戴东原(戴震)为代表的地理派,对于方志的编纂坚持传统观念,注重考据;另一是以章学诚为代表的历史派,要将史体的体裁引入方志,打破传统体例观念,故也称为革新派。清代方志体例有三种。一种是门目体或称诸目并列体,这是传统体例,即将各类事务罗门并列,一事一门排列,如顺治年间贾汉复纂修的《河南通志》,采用诸目并列体,分三十类,为“图考、沿革、星夜野、疆域、山川、风俗、城池、河防、封建、户口、田赋、物产、职官、公署、学校、选举、祠祀、陵墓、古迹、帝王、名宦、人物、孝义、列女、流寓、隐逸、仙释、方技、艺文、杂辩”。^②康熙年间修志,以此为范本,诏示天下。此体例缺乏统领,排列凌乱,在清中叶逐渐少用。第二种是纲目体,纲目体是在门目体基础上增加层次,将并列门目进行归类,由此而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如清康熙四十九年《重修凤翔府志》为五卷七篇。卷一地理,卷二建置、祠祀,卷三田赋,卷四官师,卷五人物、选举。该志以府为纲,州县为目。州县中,地理为纲,沿革、风俗、山川、古迹、陵墓等为目;建置为纲,官署、星野、城池、学校、铺舍等为目;祠祀为纲,坛庙、寺观为目;田赋为纲,里甲、户口、田粮、课程、诸役等为目;人物为纲,恩命、孝义、贞烈、名宦、进士、举人、荐举、例贡、恩例等为目。在清

① 王德恒:《中国方志学》,大象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18 页。

② 刘永之、耿瑞玲:《河南地方志提要》,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上册,第 21—22 页。

中叶又出现将史体引入方志,以史体的体裁分门设类,将方志分为纪、表、志、传、略、录等门,“如光绪年间李鸿章主修的《畿辅通志》300卷,一至十五卷为纪,包括诏谕、宸章、京师、陵寝、行宫;十六至四十四卷为表,包括府厅州县沿革、封建、职官、选举;四十五至一百八十二卷为志略,包括舆地、河渠、海防、经政、前事、艺文、金石、古迹;一百八十三至一百九十二卷为宦绩录;一百九十三至二百八十六卷为列传;二百八十七至二百九十七卷为杂传;二百九十八至二百九十九卷为识余;三百为叙录。”^①《畿辅通志》以纪、表、志、传、略、录六种体裁做纲,统领了300卷内容。第三种三书体,为章学诚所创,即将方志分为志、掌故、文征三部分,志为著述,掌故和文征为资料,章学诚的这一构想,在他主编的《湖北通志》得以实现。《湖北通志》采用三书体,包括《湖北通志》《湖北掌故》《湖北文征》,后附《丛谈》。《通志》74篇,包括二纪、三图、五表、六考、四略、五十三传;《掌故》66篇,包括吏科四目、户科十九目、礼科十三目、兵科十二目、刑科六目、工科十二目;《文征》八集,分甲、乙、丙、丁各上、下集。后附《丛谈》四卷。《湖北通志》没有刊印。三书体在修志中采用不多。

民国时期。民国六年(1917年),北洋政府曾下令全国各地纂修地方志。民国十八年(1922年)十二月,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布《修志事例概要》,要求各省设立通志馆,编拟志书凡例及分类纲目,对方志材料、文字、地图以及内容,都作了相应规定。1944年,又公布了《地方志书编修办法》9条,规定地方志书分省志、市志、县志三种;省志30年一修,市志及县志15年一修。对于方志编纂的要求与1922年的《概要》大致相同。1946年再次重申修志事宜。民国时期时局动荡,很多志书修成稿件而没有刊印,“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民国方志有1629种”^②有些边远省区也修了方志,如西藏此前没有一部像样的方志,民国时期纂修13种县志。一些著名学者主持并参与方志的编纂,如黄炎培撰《川沙县志》、余绍宋撰《龙游县志》、李泰棻撰《阳原县志》、刘盼遂撰《长葛县志》、黎锦熙撰《洛川县志》等。民国时期方志的体裁仍以纲目体为多,除

① 来新夏主编:《方志学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6页。

② 仓修良:《方志学通论》,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第381页表格。

依照旧志分设类目外,民国方志已开始关注现代科学,并根据现代科学发展和实际情况,增加新的类目,如地质、地形、气候、交通、民族、生产等。民国时期对于方志学的研究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准,其间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方志学专著,如李泰棻《方志学》、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黎锦熙《方志今议》、寿鹏飞《方志通义》、甘鹏云《方志商》,同时还有大量的方志理论研究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6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方案》中,提出编写方志任务,列为该方案20个重点项目之一,并组成国家地方志小组领导此项工作。“据国家档案局调查统计,至1960年,全国已有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530多个县进行编修新方志工作,其中250多个县编出了初稿,正式出版的有近30部。”^①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修志工作中断。“这个时期所修新志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史志不分,宣传色彩较多。例如,《怀来新志》全书分为在怀来盆地上、塞上风云、人民翻身作主人、人民公社好、工业的飞跃、农业的飞跃、文教在飞跃、怀来在前进中8个目。”^②此次修志成稿不多,出书更少,无论编纂质量如何,还是保存了当时的一些资料,包括志书所反映的宣传色彩,也是那个时代的特征,都有参考价值。

1977年,山西省寿阳县率先成立县志编纂委员会,1978年,中共湖南省委决定恢复《湖南省志》的编纂工作,并于1979年8月成立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称为全国最早成立省级修志机构的省份。最早上书提议修志并被中央领导人做了批示的人是山西省临汾市的李百玉。1979年5月1日,李百玉撰写《县志应当续订》一文,投书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光明社报》社,建议在全国开展修志工作。同年,他又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届二次会议秘书处投寄了《建议续修县志》的建议。7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李百玉建议修志的信上批示:“大力支持在全国开展修志工作。”黑龙江省呼玛县委、县政府于1979年初决定组织编写班子,编纂《呼玛县志》,1980年1月《呼玛县志》内部发行,成为此次启动新方志

① 仓修良:《方志学通论》,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第397页。

② 王德恒:《中国方志学》,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第130—131页。